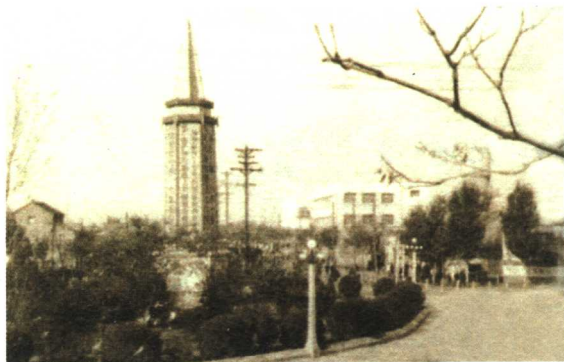


文史撷萃

下

WEN SHI XIECUI



赵国成 张放涛 /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文史撷萃 ①

赵国成 张放涛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杂忆

嵇文甫

一、从一首回忆诗谈起

一提起辛亥革命，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中学时影响我最深的一位老师刘粹轩先生。当1926年革命高潮中我的思想很感震动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忆先师刘粹轩先生》，现在回忆，就从这首诗谈起吧。诗的原文抄录如下：

凄凄无限情，当向何处守？中夜念吾师，
辗转不成寐。忆昔庚辛间，卫城得趋侍。
莘莘数百人，爱我独优异。倾谈常夜分，
教诲良深至。纵横论书史，慷慨感身世。
我善师为喜，我过师为悲。我有尺寸获，
皆为师所赐。广州败讯传，悲愤塞胸臆。
武昌举义帜，弃家奔国事。尤忆某日晚，
吾师突临往。匆匆一席谈，从此邈然逝。
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死者固无憾，
生者处何地？忽忽十余年，往事如烟。

辕下徒局促，拊髀自怆然。

二、学校中弥漫革命空气

我是辛亥前一年考入卫辉中学的。常听老班同学说：前任校长石松虎（记不清是否这两个字）先生，在校中积极鼓吹革命；历史教员薛仲超先生，善演说，亦宣传新思想，所以校中空气，蓬蓬勃勃，一时甚为活跃云云。我当时听着虽亦为之神往，惜未能躬逢其盛，他们此时都已去职了，但是继他们而来者另有其人。如监学暴质夫先生、英文教员张宗周先生、经学教员刘粹轩先生，都是同盟会人物。后来刘先生和张先生都牺牲了。记得一次，刘先生处来一山东客人刘冠三，化装小贩，推着小车，在校中住了一二十天，常和同学们密谈些时事问题。当时我隔壁就是知府衙门，知府华辉尚在梦中，不知道在他眼皮下革命党人就闹得锅滚呢！

三、革命家热爱青年

这里要谈一谈我所敬爱的刘老师。当时刘老师担任的课程是经学，正在讲《左传》。他善讲说，又贯注以满腔热情，设身处地，借古讽今，什么郑庄公啦、晋文公啦，都讲得绘影绘声，活灵活现，使大家都听得入神，不知吃饭钟已响。我那时才十五岁，只天真地佩服他。有一次，也不管他是否担任国文课程，就拿一篇作文去请他指正。他看了很高兴，就叫我常到他那里去。从此每隔三五天或十天半月，我就到他那里借书阅读。我还记得第一次借读的书就是吴汝纶评点的《史记读本》。当我每次还书的时候，他总是详细查问和指点。他给我讲过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讲到“士穷乃见节义”一段，若不胜其感慨。又

常拿当日报纸指给我看，谈他自己和朋友们劫狱救阎子固（与刘老师同县，亦参加革命，辛亥后被害）的故事等。有时也评论河南人才，叙述生平志愿和家庭情况。谆谆切切，常至夜分。尤忆某次考“修身”课，刘老师也在监场。我不到一刻钟就交卷。刘老师冒雨找到我宿舍中，看我做什么，告诫我以后不要这样草率。可以想见，他对于一个青年，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个有血性、讲义气、肝胆照人的革命者，其对人一片赤诚，自不同于一般庸俗之辈。当刘老师离校后，我很长时间感觉若有所失，好像是精神无所寄托了。

四、在革命大海中

刘老师在我校组织“观摩会”，表面上无非是讲修养、记日记、写读书心得等一些普通学习活动，可是实际上借此联系许多青年，乘机把他们引导到革命道路上。他常和同学们谈时事，当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传闻黄兴亦受伤，他在和我一次谈话中就表示深切的悲愤与惋惜。及武昌起义，他精神上很震动，有好几天我见他神色和平常不一样。他说很苦闷，叫我常去谈谈。很显然，这时候他内心有很深沉的考虑。不久，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学校亦闻风惊散。刘老师遂决然远飏，投身革命事业。

有一天，我刚刚吃过晚饭，刘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门口，叫我领他到李雪堂家去。到后，又邀五六位同志，我只记得其中一人，就是我在初小时的一位老师范子敬先生。当时他们都谈些什么，我也不大懂得。只听他们说要炸断某段铁路云云。及夜深，刘老师叫我回去。那时候正风声鹤唳，家里人见我跟一位操外乡口音的走去，久久未归，放心不下，四出寻找，算是吃了一场虚惊。可是谁知道这一次和刘老师见面竟成永诀了。

过了好长时间，忽传刘老师在豫西被惨害。这消息是真的。原来

刘老师走后，参加了张伯英在陕西所组织的革命军，他们东征到陕州，就碰上反动军阀赵倜和周符麟。这班军阀伪装和议，邀往接洽。在革命军方面，虽疑其诈，但仍欲动以大义，使不敢阻碍革命军的前进。刘老师恐主将有失，自报奋勇，偕杨勉斋先生往敌营联系。刘老师策马先到，不意竟遭毒手。听说他死得很惨烈，后来在当地立有祠堂，现在不知尚存否。一个志节皎然、学识宏通、赤心耿耿的革命者，就这样牺牲了！这是河南革命运动的一大损失！至于我个人，更无限悲痛，在内心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五、两件琐事

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大事件，正像在我那时的幼稚心灵中只留下淡淡的影子一样，它本身也处处显示出正经历中国革命的幼年时期。当时并没有掀起广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毋宁说广大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就我所记得的两件琐事，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其一是发生在一位教会朋友郑肖三家里。有一位刚来自省城的优级师范学堂的杨先生，他讲革命党的情形，可有趣了。他似乎很激动，谈孙文怎么样，黄兴怎么样，我多不记得。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章炳麟才比周公。”我当时听着也肃然起敬。可是现在想起来，拿“才比周公”这句话来形容一个革命党人，形容章太炎，岂不可笑？从这句话也可以衡量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乃至还有些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何等模糊。可敬佩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情罢了。

其二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组织一二十个人，在一个教堂里举行庆祝会，并且还到街上去游行。只一二十个人呀！这样冷冷落落，而且在帝国主义者的教堂里！拿现在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来对照，显然是两个世界了。

武昌首义亲历记

徐万年

共进会联络党员万年约同邓玉麟同志，过江访河南邓县人、在汉座庄烟客翁耀西，介绍认识后引入本党。在炮队先开同乡会联络党员，使兵士练习武术，聘请教习王三，每人每月交师薪五百文。

买占标在开封杀道台，全家逃至新野。充刽子手后，被捉解至独树，蒙友路劫，逃到武昌万年处，献出友人翁耀西之介绍信，言彼很可利用。万年就向马队同志王明泰商量，租房开馆，付洋40元。使买占标在马队驻防门口开一酒馆，名谓“豫汉酒馆”。每月又付洋7元，俾作联络各界同志应酬之费。

八月初三日，万年请假过江到汉口，迎接河南新到朋友。下午过江到巡道岭机关部见孙尧钦同志，据谈三营同志发生事情，急速回去。万年闻言，即回营询问，方晓梅青福、孟发臣诸同志为友饯行置酒，管带禁止不听，赶走杨管带，打开火药库取枪弹。万年知情，即使彼等脱离本营，更更衣过江。

十七日，邓玉麟同志到炮队商讨起事，万年即饬王鹤年同志整理炮火，务要检点完善，准时应用。复问玉麟同志，今晚发动，城内可晓响应？玉麟同志不敢确实决定，故未发动。

十八日，玉麟同志过江，万年携行李进城，到城门前候一时许，才开城门。进城后，路上闻人背地言论“今早杀了三人，还有数十人未杀”

等语。万年听到此言，心如油煎，就急到友家放下行李，即往部管带公馆，在书房见到路青（晓楼之弟），据谈晓楼奉令围防炮队等语。万年闻言，即生法向各同志通知，不要害怕。虽右旗一营全系旗人，然有部管带晓楼同志负责帮助我军进行。又向各同志讲：小朝街机关破漏，孙尧钦脸部被伤，同志名册及文件均被搜，彭、刘、杨今早遇难，现在是生命所关，务于明晚发动云。

十九日，派冯征远、刘学均到南湖炮队通知邓玉麟、蔡汉卿、孟华臣、王鹤年诸同志，定于今晚初次点名或二次点名后，闻有枪声，急偕队入城。二次点名后，万年在右旗门口开放手枪，右旗同志即携枪而出。万年即派刘学均、张国栋、丁振东、马云卿、林鹏飞、刘德乐诸同志，打通湘门，迎接炮队。王鹤年进中和门占楚望台，左炮队占蛇山，右旗一营由部管带晓楼带领亦到蛇山响应，齐轰督署，步队亦继进围攻督署。马云卿受伤，王岑中十数人无着。平明，督署人员逃尽，息战。

二十日平明，黎元洪、杜锡均到楚望台看视炮队。邓玉麟同志前来向万年讲：“可将铜元拾些散给兵士，以助伙食之费，并请黎元洪急出告示，若不出，你可自由办理。”云毕，他往。黎意未定，恰有李春萱同志前来讲速编军队，刻下编多带多，编少带少。万年即讲编军办法：“此时可按守城门之兵士编起，一门编做一营，由汉阳门编起即可。”直至此，黎氏方允，前赴咨议局出告示。方到咨议局，忽闻马厂发生枪声，黎氏即由陈殿甲扶助越墙逃走。俟定后，公推黎元洪为都督，组织各部。然在未组织以前，万年即向玉麟同志讲，“部晓楼同志此次功劳，不在其下，因彼所带之兵士全系旗人，若不反助，炮队受阻，则我军之胜利恐难达到。故俟各部组成，军令部可委彼为部长”云。玉麟同志即允。万年即寻晓楼同志。不料到彼公馆，则晓楼同志早已不言而避。问及李蒙侯、张焕岑等同志，方悉晓楼同志因事前为张同亮等犯事开除，仇恨在心，恐彼等趁时伤亡家属，故此偕眷逃回河南。由此，只好暂作罢论。俟各部组成，万年与刘仲文同志组织总监察，大局稍定。

二十五日，河南开去清兵一旅，驻于刘家庙。万年为大局关系，偕

冯征远同志前往敌营，并带布告数张，见敌旅长，宣讲大义，同为汉族，不应受满奴指示，仇视同胞等语，并将布告亲交敌旅长，即回。第二日，邀潘善伯同志过江，看视孙尧钦同志之脸伤如何，即讲昨日往敌营见敌旅长宣讲大义，并给布告数张之事。尧钦闻毕，即向万年讲“再不要冒险前去，今日同志数人被捉，均遭枪决”等语。万年闻言，复向尧钦说：“既是如此情况，炮队之中上下老人，暂照本职，以备应敌作战，俟日后稳定，再行升赏。”尧钦亦即应允。言毕，即与善伯同志转回武昌。

二十七日，万年带炮队过江，开始向敌作战，炮声一响，敌即退北。

二十九日，清政府又遣陆军大臣荫昌乘车南下。万年急领炮队在三道桥迎头痛击，一弹发出，恰中车头，荫即丧胆，不战而退。胜利回省，经汉市，爆竹声不绝，欢迎我军凯旋。

九月初六日，敌又水路来攻武汉。万年于五日即偕队前赴阵地，望敌至六日平明，敌舰开炮，一弹伤我军五名，一弹未炸；然我军亦放弹还击，一弹出去，炮手马金山可已被敌弹炸伤半身，还是如生立着望彼放之弹，此弹出去，恰中敌舰烟筒，一艘沉没，余舰视其不胜，均退，此亦不愧彼之精神也。

由此，清政府视水旱两路均不能胜，次日即正式停战。

蒋介石在黄河花园口扒口、堵口的真相

徐福龄

我国古代兵争,人为决河,“以水代兵”之事,屡见不鲜。如后梁贞明四年(918年)谢彦章攻扬刘(在今东阿境),筑垒自固,决河水以限晋;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决河以阻金兵,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决河的决策者,已成为历史上的罪人。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寇西犯,重演“以水代兵”的故伎,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堤决河,使豫、皖、苏三省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付诸东流,造成了空前的浩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积极反共,他又以花园口堵口为幌子,阴谋“以水代兵”,妄想水淹解放区,再次制造浩劫。

1938年5月间,日本侵略军疯狂向西侵犯,国民党军队从徐州退却,这时开封城内大小军政机关,已闻风而逃,全部西迁。敌人不费力地就占领了河南的政治中心开封。郑州、武汉亦危在旦夕。当此紧急关头,蒋介石不但不调遣其主力部队来阻击日寇西犯,反而置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竟下令批准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扒堤决河的计划,妄图放出黄河水,造成大规模的泛滥,把日寇阻拦在郑州以东。

决河的任务,是在蒋介石的亲信薛岳、胡宗南等军事头目的指挥下进行的,当时密令驻中牟县杨桥的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在中牟赵口险

工处掘堤,并限6月4日夜十二时放水。用一个团的兵力,于6月5日掘开了黄河大堤。因这一带堤土质多沙,过水不久,即被冲塌的堤土堵塞断流,随又组织兵夫,继续挑挖,仍出水不多。这时日寇已逼近中牟白沙镇,当日又决定在赵口的上游郑州花园口掘堤扒口,立即下令当地驻军新八师师长蒋再珍执行这一任务。在掘堤前,他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十里以外。然后又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800多名士兵,分五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终于6月9日上午九时许,扒开了黄河大堤,黄水奔腾而出,循贾鲁河南下。他们深恐口门过水不利,又调来平射炮,对口门两堤头,炮轰了六七十发,以致口门扩大,全河改道。从此豫、皖、苏三省44县市,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89万多人葬身洪流,12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9亿5280多万元,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马上制造出日寇飞机炸开黄河大堤的谎言,来欺骗舆论,逃避罪责。6月11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胡说什么“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12日中央社在郑州又发出专电说:“敌机30余架,12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无法挽救。”6月30日,陈诚还在汉口举行了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亲自出马造谣,除重复了中央社的谰言以外,他还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后来外国记者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蒋帮怕暴露马脚,又在花园口附近伪造了一个轰炸现场。并于外国记者来访时,还调集大批士兵、民工作了假堵口的表演,妄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其实假的毕竟是假的,中外舆论很快就识破了蒋帮玩

弄的花招。黄河决堤不久,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国黄河决口时,就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曾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命,亦未始非计……”说明外国舆论从国民党的报道中,已窥知其中的秘密。

蒋介石扒堤决河,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外,既未能制敌军的死命,也未能阻止敌军的进攻。1938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继续溃败,武汉、广州也相继失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策划了一个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归故道,水淹解放区的新阴谋。他们打着“軫念灾黎”、“共扶沉沦”的旗号,积极组成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于1946年3月1日秘密在花园口破土动工,进行堵口。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才由中央通讯社宣布花园口堵复工程,已经开始,计划两个月完成。

那时黄河已改道八年,故道两岸的堤防由于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已残破不堪,黄河故道两岸人民,在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政府领导下,已在故道内开辟了土地,建设了新村庄,居民40余万。蒋介石这时把黄河引入故道,其罪恶目的,是为了分割和淹没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造成解放区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极大困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立即向全国各界、世界人民和友好人士发出“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当局此种灭绝人性之阴谋毒计”的强烈呼吁。

这一呼吁,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的积极响应,一致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和解放区代表就黄河归故问题举行谈判。

1946年4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第一次谈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等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一开始,国民党代表就对解放区代表提出的先复堤后堵口、施工机构由双方共同组织、河床居民由国民党政府拨款救济三项原则,加以否定。他们提出要尽先争

取堵口,复堤由解放区负责,黄河机构,不论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均须统一由国方负责,河床居民必须无条件搬家,不予救济。还高谈什么“泛区罹灾,痛心疾首,政府怜悯灾黎,早列黄河堵复为战后复员救济的首要工作”。好像花园口扒口造成的浩劫,不是他们干的,只有他们才最关心人民疾苦,想以此挑拨豫皖苏泛区和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解放区代表义正词严地指出:“豫皖泛区灾民因黄河决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达数年之久,为对拯救此数百万灾民而堵塞花园口口门,深表赞同。对河道内新建村之居民,全数迁移,虽要遭受很大损失,但为顾全大局,亦不反对。唯解放区民众,对堵口复堤有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花园口堵合之后,保证不至将豫皖泛区移于山东、河北。既然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为民造福,为什么不同意我方的主张呢?”国民党代表被迫签订了开封协议。

这次协议规定: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复堤工程大小而定。施工机构,应本统一合作原则,由双方人员参加,仍维持原有堵口复堤工程局系统。对河床内居民之迁移救济,原则上自属必要,具体办法仍俟实地履勘后,视必要情形,再行商定之。

开封协议签订后,双方人员在菏泽聚齐,共同到黄河下游实地查勘。国民党方面派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和联总工程师顾问塔德(美国人)等人参加。在历时五天的查勘中,沿途群众纷纷向他们示威请愿,反对堵口。经解放区代表多方解释,才得解围。4月15日双方查勘人员返回菏泽。当晚即举行会议。解放区代表有冀鲁豫行署段君毅、罗士高等。在开封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了菏泽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复堤浚河,裁湾取直,整理险工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故道内的新建村庄由黄委会呈请行政院每人拨发迁移费10万元(法币)。关于救济问题由黄委会呈请联总、行总救济。这时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立即开始动员复堤和迁移河道居民的组织准备工作。

菏泽协议签字刚过五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就在郑州发出简讯,公

然否定菏泽协议的一切规定。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于两月之内堵口合龙,并立即调集1.7万多民工和大批机械到花园口工地,加速进行堵口工程。4月28日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还亲到工地督工。边区人民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出尔反尔的行为,无比愤慨。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阐明了中共对黄河归故问题的立场,对国民党破坏菏泽协议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指出:“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顾民命,则首当其冲的冀鲁豫人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其后果由国民党当局负责。”中共中央提出这一严重警告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将来的后果,于是又提出在南京进一步谈判。

解放区代表王笑一、赵明甫、管大同等,于5月12日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解放区代表列举了大量事实,揭发了国民党破坏菏泽协议的行为和提前放水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在5月18日签订了南京协议。

在南京协议签订的同时,根据协议的精神,周恩来还同联总代表福兰克芮、塔德等达成了六项口头协议:(一)下游修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工。(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负责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三)行总为办理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曹州)设立办事处,由中共参加。(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组织委员会负责处理;该委员会由政府派二人,中共派二人,联总派一人,行总派一人组织之。(五)在6月15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汴新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6月15日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不超过河底两公尺为限。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这六项口头协议,是周恩来同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水利委员会主任薛笃弼反复磋商的结果,都有“确实保证,彻底实行”的诺言。

但南京协议刚签订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却又撕毁协议,在花园口开始抛石进堵,积极准备开挖引河,拆除汴新铁路,合龙放水,到6月29日黄河上涨,合龙堤前水位抬高两米,堵口桥桩被冲垮,合龙工程不得不推迟到汛后进行。

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进一步和美蒋会谈,抗议他们不执行黄河堵口协议的行为,并商谈黄河下游复堤的救济物资问题。为了安排下游的修堤工作,周恩来于7月19日从上海飞抵开封,当日乘车到花园口查看了堵口工程的进展情况。返回开封后,在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联系黄河的历史和现实,宣传了中共在黄河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他在开封期间,还把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冀鲁豫行署的领导张玺、段君毅和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接到开封,详细听取了修堤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最后嘱咐同志们,要认清形势,树立信心,不要寄希望于一纸协议,抓紧时间把堤防工程修复起来。21日周恩来返回上海。22日接着同美蒋再次就黄河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接连5天的时间内,他辗转千里,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利益奔忙。

1946年7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由于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到1947年1月,已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56个旅。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更是急于水淹解放区,蒋介石接连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和对堵口工程“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严令。蒋帮的军政大员如陈诚、顾祝同、薛笃弼都纷纷来到花园口工地,亲自督导,并且动用了大批军队运石施工,同时下令黄河水利委员会与中共断绝联系,要中共驻开封的代表撤回。周恩来于1月9日在延安发表了关于黄河堵口问题的广播讲话,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命,堵口放水。他严正指出:“目前陇海路东段战事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国民党政府已于上月底决定限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企图淹黄河故道居民、广大群众和解放区自卫部队。现此水流已越汴新铁路,不久即将经过济南。……现在黄河故道复

堤工程尚未完成,险工、取直尚未开始,故道居民尚未迁移之际,竟一面堵口,一面挖开故道引河,这将使豫、鲁两省若干万平方公里地区泛滥成灾,数百万人民的生命、房屋、财产要受到严重的损失。国民党当局所以如此残酷,其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河水势,淹死鲁、豫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生产供给,以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我们请求全国同胞、国际正义人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一致起来反对,紧急制止国民党政府这一狠毒的堵口放水行动。”周恩来的广播讲话,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于1947年3月15日,堵住了花园口口门,使汹涌的黄河水流入故道。

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对于蒋帮的假谈真堵的伎俩,早有思想准备,在南京协议后不久,即1946年5月间,黄河沿线就开始了大复堤运动。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工具,展开了和蒋帮堵口放水的英勇斗争。在复堤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经常袭击治河工地,进行破坏活动,逮捕杀害治河员工,抢劫工程料物,破坏复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河归故前几个月里,就杀害复堤员工36人,抢劫工地面粉200多万斤,麻绳45万多斤。但这并未吓倒沿河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越战越强,提出了“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战斗口号,夺取了复堤运动的伟大胜利。

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后,国民党反动派狂叫一条黄河可抵四十万大军。解放区人民在1947年4月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复堤运动,沿河42万民工,投入紧张战斗,没有石料,边区政府一声号召,沿河人民立即掀起了献砖献石运动。据当时统计,仅石料一项,就有15万立方米,比1929年到1934年国民党政府五年治河中用的石料多好几倍。经过顽强的战斗,人民驯服了黄水,蒋介石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1948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整个黄河掌握在人民手里,由战争

环境中的分区治理,建立了统一治黄机构,从此揭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治黄的新篇章。